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

——以张谷英村为例

窦银娣^{1, 3} 叶玮怡² 李伯华^{1, 3} 刘沛林^{1, 3, 41}

(1. 湖南省人居环境学研究基地,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2. 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81;

3. 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湖南 衡阳 421002;

4. 长沙学院乡村振兴研究院, 中国湖南 长沙 410022)

【摘要】: 文章从“三生”空间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 以张谷英村为研究对象, 测算了其旅游适应性水平, 为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研究提供了一个量化视角。结果显示: ①“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反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面对旅游开发的适应特征和适应程度, 具体表现在空间功能旅游化、空间营建有序化和空间属性提质化三个方面。②3个子系统中, 适应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 除生产空间为一般适应, 其余均为比较适应; 子系统间得分差异较小, 表明3类空间的旅游适应能力较均衡。③各空间类型对3类要素的适应程度上表现出内部差异, 空间功能层面, 生态空间景观功能发挥不足, 生产空间旅游经济结构单一; 在空间营建层面上, 生活空间住宅建设无序、公共空间不足, 生产空间耕地利用率低; 空间属性层面总体适应良好, 但生产空间在景点开发、环境承载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 “三生”空间 土地利用 旅游适应性 空间功能旅游化 旅游推动型村落 评价体系 传统村落

【中图分类号】: F5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2) 07-0215-10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 乡村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如何寻求一条合适的转型发展道路, 促进社区能力提升、地方经济发展和生态系统稳定, 已经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旅游作为一种市场推动力, 已被证实是一条能有效促进乡村社会转型的道路, 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双重驱动下, 通过主客交往、供需关系、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 可积极引导乡村地域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优化转型^[1-2]。与此同时, 城市元素对乡村系统的冲击也日益凸显, 旅游种群入侵并挤占社区种群生态位, 使得均质空间逐渐异质化, 乡村内部部分空间特化为旅游功能空间, 宗法型空间秩序在旅游与社区的密集互动中不得不重组为旅游生产型空间秩序^[3]。旅游活动参与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不断复杂化, 原有的空间载体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2171215、42071195);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 (20B085);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1JJ30062、2022JJ30100)

作者简介: 窦银娣 (1982—), 女, 安徽合肥人,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学。E-mail: wyzjjzjj@163.com
李伯华 (1979—), 男, 湖北黄冈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人居环境学。E-mail: libeny_2058@163.com

和空间要素不能适应和满足乡村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需求,表现为产业结构单一、文化冲突凸显、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传统村落作为乡村地域系统的独特地理单元,在旅游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空间重构与优化的旅游适应过程。因此,探索传统村落旅游发展与空间要素的适应性关系,推动双向调适,实现传统村落的有机更新与物质文化活态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

一直以来,作为国土空间开发的重要内容,“三生”空间对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和推进乡村转型发展有着重要意义。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明确了“三生”空间的发展要义。目前,“三生”空间的研究广泛应用于土地利用^[4]、国土开发^[5]与国土规划^[6],研究内容涵盖“三生”空间的内涵逻辑关系^[7]、分类体系构建^[8]、适宜性评价^[9]、空间格局演变^[10-11]、功能空间识别^[12]、功能耦合协调^[13-14]等方面。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使得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三生”空间中生态空间的作用和价值,关于土地利用转型带来的生态环境效益和生态服务价值研究^[15-16]开始起步。与此同时,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人的需求对地理空间的意义,从行为视角出发进行空间识别^[17]和空间演化机制分析^[18]。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国土空间规划的全面开展,“三生”空间的研究地域逐渐由城市扩展到乡村,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19-20]、土地整治模式^[21]、乡村空间重构路径^[22]等领域,耕地红线、城镇边界线的提出也使更多学者将目光转向乡村地区的“三生”空间划定^[23]。总体看来,“三生”空间的研究重心仍然存在“城市主义”倾向,对乡村地域的“三生”空间关注不足,对旅游推动型传统村落的“三生”空间关注更少,尤其缺乏关注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旅游适应情况。基于此,本文试图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建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评价体系,分析与测度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程度,为传统村落活态化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经验借鉴。张谷英村位于湖南省岳阳县以东的笔架山下,具有600多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以当大门、王家墩、上新屋为主的三大古建筑群,民房、厅堂、天井、巷道构成纵横交织的“干枝式”布局,沉淀了深厚的建筑文化。张谷英村先后于2001、2003、2009和2012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首批全国历史文化名村、首批中国生态文化村和首批中国传统村落,2018年接待游客60多万人次。选择张谷英村为案例地,主要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考虑:①张谷英村是一个典型的旅游推动型传统村落;②张谷英村“三生”空间在旅游主导作用下变化显著,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演化规律和旅游适应性。③由于旅游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张谷英村空间要素的旅游适应性问题突出。

1 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分类体系及其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

1.1 “三生”空间概念内涵

“三生”空间就是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是人类活动中对周边自然环境空间的一种划分形式。学术界对“三生”空间的概念尚无统一定义,综合学者的相关解释,“三生”空间的内涵主要来源于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基本可以做出以下概括:生活空间是人们居住、消费和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承载、物质和精神保障功能;生产空间是生产经营活动的空间载体,以提供工业品、农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要功能;生态空间是维持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本底,以提供生态产品、生态服务和生态防护为主要功能^[12, 24-25]。“三生”空间实质上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形态上的动态映射,其涵盖的3个子系统不是相互独立的存在,而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图1)。其中,生态空间是基础,生产空间是根本,生活空间是目的,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呈现出尺度差异性、功能复合性、范围动态性、用地异质性等特征^[6]。

1.2 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分类体系

“三生”空间分类体系的构建必须建立在科学性和适应性原则的基础上,要求准确把握空间尺度,突出土地功能的多样性和主体性,充分考虑区域现实因素,以识别单一功能空间和主导功能空间。传统村落转型发展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各空间旅游功能化态势明显,演化出传统物质空间和新型复合空间两种类型^[26]。进一步将其划分为6个一级类、12个二级类,并对各二级类进行细化和延伸,提出类型表征,构建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分类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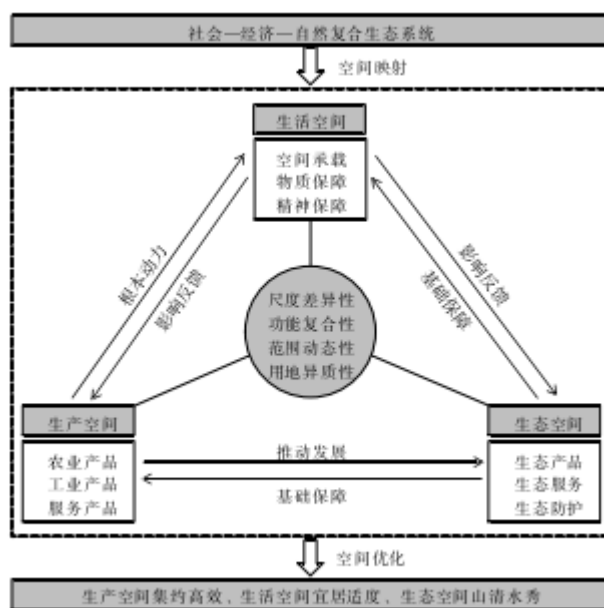


图1 “三生”空间系统构成

由于新型复合空间内各要素交融深刻，其主导功能的判别争议较大。根据旅游推动型传统村落的土地利用特点，复合型空间主要划分为生活—生产型、生产—生活型、生态—生产型3类。前两类空间都是在原有生活功能的基础上新增旅游生产功能，但按生产功能发挥的强度不同，空间主导功能也有所区别。生活—生产复合型空间重点指旅游核心区边缘和外围的商住混合用地，受区位条件的影响，旅游活动强度弱，整体上生产功能弱于生活功能。生产—生活复合型空间重点指人文景观开发用地和道路交通用地，人文景观开发用地主要位于旅游核心区内部，作为旅游吸引体、产业支撑体，旅游要素更为密集和活跃，其生产功能强于生活功能；道路交通用地分为对外交通用地和对内道路用地，对外交通用地以生产功能为主，对内道路用地因旅游活动的开展，生产功能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此外，生态游憩用地虽生产功能突出，但生产功能的发挥有赖于生态环境，作为村落自然本底的一部分，其生态功能对村落及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更胜于生产功能，因此将其归类于生态—生产复合型空间更为准确。

1.3 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

适应性概念最初源于自然科学，是指个体或系统通过改善遗传或行为特征更好地适应变化，并通过遗传保留下相应的适应性特征^[27]。由此，乡村旅游适应性可引申为乡村系统各要素通过某种机制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旅游适应过程和旅游适应特征。“三生”空间是“社会—经济—自然生态系统”在土地利用形态上的动态映射，旅游驱动下乡村系统的适应过程和适应特征不可分离性地被转移到土地利用形态上。土地利用形态通常具有显性与隐性两种形式^[28]，“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主要表现为各空间类型在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上的旅游适应状况（图2）。

土地利用显性形态的旅游适应性表现为乡村空间重构，具体体现在空间营建有序化和空间功能旅游化两方面。乡村空间重构是在内生发展需求和外源驱动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是乡村社会经济结构重新塑造的过程，是对乡村“三生”空间的优化调整和根本性变革^[29]。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既是旅游要素延伸带动空间功能和形态改变的过程，又是传统空间格局对旅游发展逐渐适应的过程。从空间结构来看，传统村落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边缘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村外农业生产向村内旅游经营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11]，空间营建逐渐有序化；从空间功能来看，传统物质空间逐渐向新型复合空间演化，在原来的空间基础上叠加了旅游功能，生产—生活空间融合发展，生产—生态空间功能叠加，表现出产业发展空间分散化、农民居住空间稀释化、资源利用可持续化的空间重构特征^[27]，空间功能旅游化态势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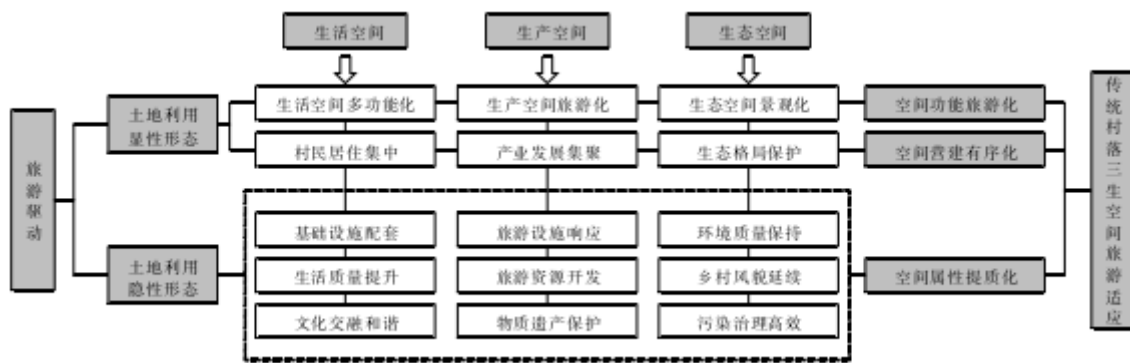


图2 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

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旅游适应性表现为空间属性提质化。旅游引导乡村系统由传统模式转向现代化模式，产业非农化和人口城镇化带来经济结构、资源开发、服务设施、遗产保护、环境质量等空间属性的提质优化；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开发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活空间的基础设施不足、文化冲突凸显，生产空间的土地利用粗放、产业结构单一，生态空间的环境污染严重、景观格局破坏等诸多问题，更需关注空间属性质量的提升，以增强旅游适应性，满足游客旅游需求和居民生活需求，实现“三生”空间系统的新稳态。

2 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评价模型

2.1 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立足于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分类体系，设立生活空间适应性、生产空间适应性、生态空间适应性三大准则层。基于分析框架（图2），设立空间功能、空间营建、空间属性3个要素层。综合考虑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特征和村落转型发展引发的现实问题，借鉴旅游可持续性评价等研究理论^[30-31]，选取了旅游适应性指标层。指标层强调空间功能旅游化和空间营建有序化在旅游适应中的能动作用，力求体现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旅游适应程度，在遵循全面性、代表性、独立性、科学性原则的基础上，尽量达到精简、易操作的要求，最终选取19个指标。

生活空间适应性 B1：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生活空间被大量开放为满足游客需求的复合型空间，旅游功能化成为生活空间的一个显著适应性特征。住宅建设无序和公共空间缺失一直是乡村惯性发展问题，对旅游用地规划、旅游多元需求的适应与满足更具潜在性影响。生活空间属性指向宜居适度的生活环境，物质层面要保障基础设施、提升生活水平，精神层面则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放在首位。基于此，选取以下6项指标：①居住空间旅游功能化程度，描述原有单一居住功能空间向产居复合功能空间转化的情况，旅游功能增加是社区主体对旅游市场的一种适应行为。②住宅建设有序性，反映空间资源合理利用的可能性，住宅建设无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空间，特别是旅游产业用地的规划与布局。③公共空间营建，反映乡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状况，公共空间萎缩将导致旅游感知质量下降，居民日常生活受限，文化冲突加剧。④基础设施水平，描述居民生活和旅游服务的基础保障状况。⑤生活质量和水平，反映旅游发展对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状况，影响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态度。⑥民俗文化遗产，反映传统文化原真性的保留状况。

生产空间适应性 B2：旅游发展带来空间生产功能的适应，首先是农业向旅游业的转型，表现为旅游收入占比上升；其次是旅游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表现为单一向多元发展。空间营建方面，旅游产业布局对旅游感知、经济增长、长期发展等具有显在影响；此外，耕地撂荒对乡村性的破坏与日俱增，相关评价指标却鲜少涉及。旅游设施和旅游资源是重要的生产空间要素，前者的适应性主要体现于质量水平，而后的适应性主要体现于能为资源带来附加价值的可控的后期开发和保护状况。基于此，选取

以下 8 项指标：①旅游收入占人均年收入比例，反映生产空间功能转型情况和旅游发展水平。②旅游经济结构，反映满足游客不同需求的各个旅游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旅游产业结构越多元，适应性越强。③旅游产业布局合理性，反映了资源利用程度和利用效率。④耕地利用率，表示耕地利用集约度，耕地利用率低将导致传统田园风光和农耕文明的丧失，从而失去乡村旅游的意义。⑤旅游服务设施水平，反映对游客住宿、餐饮、娱乐、购物等要求的满意程度，影响游客的旅游决策。⑥空间资源承载力，表示现有空间资源对旅游活动的最大负荷能力。⑦景点规模与丰度，反映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状况。⑧文物古迹保护状况，表示古建筑的完好程度和修缮情况。

生态空间适应性 B3：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村落趋向于依托生态环境构建自然景观轴线，以丰富旅游活动内容，生态空间景观化态势明显。考虑到乡村建设肆意破坏和改造生态格局的现实情况，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对生态环境的高要求，空间营建应以保护传统生态格局为重点。空间属性方面，传统村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化格局要求山清水秀、融于自然的整体环境。基于此，选取以下 5 项指标：①生态环境景观化程度，反映旅游开发对自然生态景观的利用情况。②生态格局保护状况，描述水系、山体形态的保护状况。③生态环境质量，选择空气质量、水体质量、植被覆盖率和噪声强度等具体指标进行分析。④整体环境协调度，描述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协调程度，从建筑污染和视觉污染两方面评价传统村落融于自然的情况。⑤污染物处理能力，衡量废水、固体废弃物的处理率及处理方式。

2.2 数据来源

由于评价指标具有半定性、半定量的特征，研究所需数据采用专业调查与感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获取。依据表 3 赋分标准，对其中一些定量和专业性的指标采用资料收集和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包括 C1、C2、C3、C7、C8、C9、C10、C15、C16、C19 共 10 项指标；其余 9 项定性指标采取面向不同利益主体的问卷调查获得数据，问卷采用五级制打分法，C11、C12、C13 采用游客问卷调查数据，C4、C5、C6 采用居民问卷调查数据，C14、C17、C18 采用游客、居民共同调查数据。由于研究需要和研究方法的特性，不同问卷处理方法相同，并对共同部分进行合并分析。此外，张谷英村土地利用现状结合 GoogleEarth 高清影像图（2019 年 4 月），通过实地考察获取；内部资料来源于张谷英管理处，主要包括张谷英村旅游发展的基本统计数据、古建筑群保护规划（2004—2020）、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09—2030）等。本课题组于 2019 年 5 月到张谷英村进行实地调研，共发放问卷 180 份，收回 176 份，最终有效问卷 172 份，其中游客问卷 90 份，居民问卷 82 份，有效率为 97.72%。有效深度访谈 9 人次，分别为村干部 2 人、当地居民 3 人、游客 4 人。

2.3 研究方法

2.3.1 层次分析法

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实现主观评判信息的定量化，确定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权值，以提高决策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其具体操作步骤包括：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层次排序及一致性检验。

判断矩阵的构造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综合专家意见，按 Santy 的 1-9 标度法两两比较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填写 B 层判断矩阵：

$$M = \begin{vmatrix} 1 & 1/3 & 1/3 \\ 3 & 1 & 2 \\ 3 & 1/2 & 1 \end{vmatrix}$$

$$CR = \frac{\lambda_{\max} - n}{(n - 1) \cdot RI} \quad \text{式中:}$$

计算判断矩阵 M 的特征向量: $w = (0.1396, 0.5278, 0.3325)$ 。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CR 为检验系数; $\lambda_{\max}$ 为最大特征根; n 为矩阵阶数; RI 为随机一致性指标。一般地, 若 $CR < 0.1$, 则认为该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矩阵最大特征根 $\lambda_{\max} \approx 3.0536$, $RI = 0.52$, $n = 3$, $CR \approx 0.0515 < 0.1$, 通过一致性检验。同理, 建立 C 层判断矩阵, 进行权重计算和一致性检验, 最终得到各因子的权重关系。

2.3.2 模糊综合评价法

采取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传统村落“三生”空间的旅游适应性进行赋分评价, 计分标准分为 5 个等级, 即 $Y = \{5 \text{ (好)}, 4 \text{ (较好)}, 3 \text{ (一般)}, 2 \text{ (较差)}, 1 \text{ (差)}\}$ 。模糊得分与权重相乘即为综合得分, 数学模型如下式:

$$A_j = S_j \cdot W_j \text{ 和 } A_j = \sum_{i=1}^n A_{ij} \quad \text{式}$$

中: A 为评价综合得分; S 为因子模糊得分值; W 为因子权重值; i 为第 i 项因子; j 为第 j 项评价单元。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整理, 统计各指标因子模糊得分值, 得到张谷英村“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评价结果。

3 “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等差分级法对旅游适应性模糊得分进行等级划分, 将张谷英村“三生”空间的旅游适应性分为完全不适应(1.00~1.80)、比较不适应(1.81~2.60)、一般适应(2.61~3.40)、比较适应(3.41~4.20)和完全适应(4.21~5.00) 5 个适应程度等级[32], 最终评价结果见表 4。将评价结果直观化, 可对比 3 类空间在空间功能、空间营建、空间属性上的适应程度(图 3)以及各指标模糊得分差异状况(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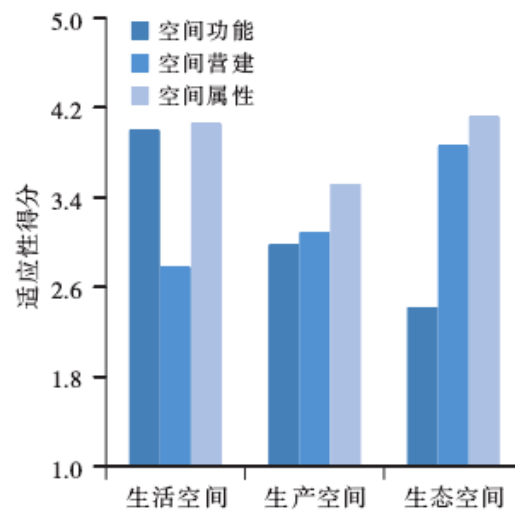


图 3 各要素层适应状况

3.1 生活空间适应性分析

张谷英村“生活空间适应性”综合得分为 3.44, 为比较适应。三大要素层中, 空间功能和空间属性为比较适应, 而空间营建为一般适应, 成为生活空间的旅游适应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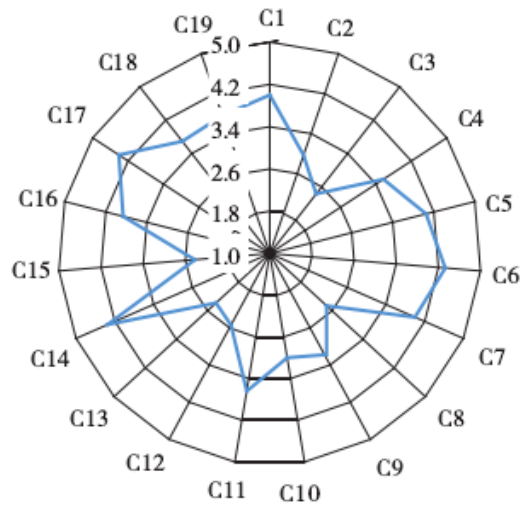


图4 各指标模糊得分情况

空间功能层面，居住空间旅游功能化程度（4.00）较高，处于比较适应水平。这反映了社区主体旅游参与程度较高，在“趋利避害”动机引导下积极转变空间行为以响应旅游市场，表现出较高的旅游适应性。但居住空间旅游化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状况，远离旅游路线的区域，尤其是村落外围区，旅游红利难以惠及，并未形成“产居一体化”的新型复合空间。

空间营建层面，公共空间营建（2.43）在整个子系统中得分最低，其次是住宅建设有序性（2.97），分别为比较不适应、一般适应，存在较严重的旅游不适应问题。住宅建设方面，政府严格控制新建、改建，尚未出现住宅空置、废弃、无序扩张的情况，但对已存在的住宅缺乏实质性的调控手段。核心区现代住宅分布于古建筑群间，严重影响了游客原真性体验感，更是加剧了空间冲突；外围区住宅布局散乱（图5），居民点用地规模未得到有效控制，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率，也影响了传统田园生态景观的存续，限制了农耕体验功能区的开发，对张谷英村旅游产业的多元化发展造成潜在的不利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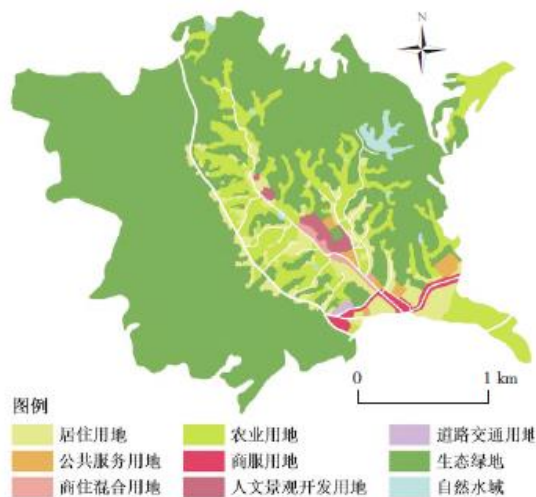


图5 2019年张谷英村土地利用现状

公共空间营建方面，大多将居民社交功能型活动空间转化为游居互动型公共空间，公共空间整体不足，且生活功能与旅游功

能过分重叠,缺少分离的独立空间。旅游功能强化导致部分社区功能的弱化,村民日常活动和游客旅游活动相互干扰,文化冲突加剧;其次,公共空间形式单一,多为观览展示型,缺乏民俗文化体验型、休闲娱乐型公共空间以及公共绿化节点,难以满足游客深度体验的多元化需求。

空间属性层面,民俗文化遗产(4.33)为完全适应,生活质量和水平(4.05)、基础设施水平(3.57)为比较适应。张谷英村传统文化保留较完整、传承度较高,增强了游客的旅游体验感。而居民也充分体会到了旅游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反过来促进其保护旅游资源和支撑旅游开发。基础设施基本能够满足旅游发展和居民生活需求,但比起其他两者而言有待提高。

3.2 生产空间适应性分析

张谷英村“生产空间适应性”综合得分为3.22,为一般适应。除空间属性为比较适应,空间功能和空间营建均为一般适应。生产空间是旅游产业的主要载体,其适应程度直接影响旅游开发进程,但从整体来看,本子系统的适应性能力不如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空间功能层面,旅游收入占人均年收入比例(4.00)为比较适应,旅游经济结构(2.46)为比较不适应。调查结果显示,张谷英村旅游收入占人均年收入的70%左右,说明村落已完全实现生产功能的转型,旅游经济效益良好,可观收益使村民更积极地投入旅游开发中,从而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张谷英村旅游产业以观光、餐饮和住宿为主,缺乏农事体验、生态游憩等娱乐项目;旅游商品较为单一,同质化倾向严重,难以刺激游客购物意愿,旅游购物收入占比极低。旅游经济结构较为单一,表现出明显的旅游不适应。

空间营建层面,旅游产业布局合理性(3.18)、耕地利用率(3.00)处于一般适应水平,适应能力不强。实地调查显示,由于景点规划偏向,旅游产业大量集中于“当大门—王家墩”一带,后方上新屋旅游设施极少,旅游产业空间布局不平衡;其次,不少居民在外围区兴建旅游营业场所,但由于与主要旅游路线脱节,且布局分散,难以实现规模化经营。张谷英村耕地利用率不高,主要是因为旅游发展造成村民生产方式的逐渐非农化,且经营耕地的收入和劳动比较效益小,村民已很少涉足农耕经济。耕地资源虽得以保留,但利用率低,尤其核心区周边耕地大面积闲置,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还使得传统田园生态景观和农耕文化无法展现,降低了生产空间的旅游适应性。

空间属性层面,文物古迹保护状况(4.35)为完全适应,旅游服务设施水平(3.64)为比较适应,景点规模与丰度(2.38)、空间资源承载力(2.54)为比较不适应。景点规模与丰度在本子系统中得分最低,成为提高生产空间旅游适应性的首要解决问题。调查数据显示,56.8%的游客认为景区规模小或较小,53.4%的游客认为景点数量少或较少。张谷英村只开发了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人文活动3项旅游资源主类,龙形山、笔架山等地文景观、生物景观未做梳理;景点多为观览型人文景观,种类单一,全部位于历史观览展示区,田园生态区、农耕体验区、生态绿化区均未开发,从而限制了景点规模和丰度。村落旅游空间资源承载力明显不足,现有的100个停车位、450个床位根本无法满足旅游旺季的游客需求,村内道路狭窄,通行能力较差,旅游空间资源日益紧张。此外,旅游服务设施存在接待水平较低、道路指向性差、景点标识不明显、巷道照明条件差等问题,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3 生态空间适应性分析

张谷英村“生态空间适应性”综合得分为3.64,为比较适应。本子系统旅游适应性较高,除空间功能的生态环境景观化程度外,空间营建和空间属性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比较适应水平之上。

空间功能层面,生态环境景观化程度(2.42)得分最低,为比较不适应。景点中仅有畔溪走廊实现了水系的景观化处理,但

依然存在水量不足、水流景观单一的问题；大量梯田闲置，未通过景观化和生态化处理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自然山体的生态环境未被利用。自然景观轴线缺失，浪费了大量生态景观资源。

空间营建层面，生态格局保护状况（3.86）为比较适应。早期受建设活动和人口膨胀影响，部分山体 and 林地被开发为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近年来，政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扩展和植被破坏行为，历史山体环境没有受到进一步破坏，留存的历史植被较多，水系基本完好，传统生态格局保护状况良好，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

空间属性层面，生态环境质量（4.41）为完全适应，整体环境协调度（3.69）、污染物处理能力（3.76）为比较适应。整体环境协调度虽得分较高，但在部分新建民居、服务性建筑的立面整治，自来水管线和电线的技术规范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目前张谷英村的生态系统质量处于健康水平，村落配有专门的污水管网和垃圾处理设施，能够及时、集中处理污染物，但有少量污水排放到水量低、自净能力弱的渭溪河，需要进一步加强整治。

4 结论与对策

4.1 结论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传统村落旅游适应性，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传统村落社会亚系统、经济亚系统、生态亚系统的旅游适应程度和能力。本文立足于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分类体系，构建了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指标。利用该评价模型，通过 AHP 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张谷英村“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显示：①现阶段张谷英村“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总体处于一般适应水平，旅游适应程度不高，但接近于比较适应水平；3 个子系统中，适应程度最高的为生态空间，其次为生活空间，两者均为比较适应，最低的为生产空间，为一般适应；子系统间得分差异较小，表明 3 类空间的旅游适应能力较均衡。②从要素层面看，生活空间在空间营建方面表现不足，生态空间在空间功能方面表现不足，生产空间处于较低的均衡水平；空间功能得分差异明显，空间营建次之，空间属性得分差异最小，均处于比较适应水平，说明 3 类空间对空间功能和空间营建的适应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③从具体指标看，11 项指标处于比较适应水平之上，其中民俗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保护状况、生态环境质量 3 项指标为完全适应，各类空间在旅游资源保护方面适应性较强；其余 8 项指标中，生活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分别有 2、5、1 项处于一般适应或比较不适应水平，说明 3 类空间均存在较为突出的旅游不适应问题，尤其是生产空间在景点规模与丰度、旅游经济结构、空间资源承载力等方面对旅游发展响应不足，旅游适应性弱，一定程度上阻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4.2 对策

随着旅游市场需求日益多元化、高质化，旅游推动型传统村落需要及时跟上旅游发展的新趋势，带动村落“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转型升级。旅游发展进程中传统村落呈现出的种种旅游适应问题均可在“三生”空间上得以反映，因此，迫切需要从“三生”空间视角出发，寻求一种旅游适应机制和功能提升模式。根据评价结果，本文提出三点建议：①塑造乡村特色公共空间。在各个旅游节点适当扩大公共活动场所，既要有游居重叠的互动空间，又要有游居分离的独立空间；增加传统村落民俗文化体验型、休闲娱乐型公共空间以及公共绿化节点，为传统文化与乡村氛围深度融于旅游活动提供空间依托。②构建多元高质服务模块。张谷英村旅游娱乐、旅游购物功能模块缺失，可在旅游娱乐方面增加参与式旅游项目和传统游乐设施，开展写生摄影、野餐野营、农耕体验、工艺品制作等体验活动项目；在旅游购物方面，规划推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宗族文化的工艺品，避免同质化倾向，建立传统工艺店和特色购物街，以刺激游客消费意愿。③梳理生态游憩景观资源。充分利用村落水域风光、梯田景观、山地环境，打造“流水景观—田园景观—地文生物景观”的梯级自然景观轴线，并增设相应生态游憩活动，与人文景观轴线有机融合，充分展示传统村落“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居环境意象。

作为旅游推动型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张谷英村“三生”空间旅游适应性研究可为该类型传统村落旅游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

案例支撑。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传统村落空间重构的复合化、生产化特征,部分要素的空间隶属关系难以确定,尤其是生活资源要素和生产资源要素高度融合,还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细化。其次,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依据实际情况去粗取精的过程,它的科学性、实用性和普适性还有待验证和完善。最后,评价指标中的部分赋分标准为模糊的定性概念,仅适用于特定的研究区域,还需探索评价指标的统一性和可比性。

参考文献:

- [1]保继刚,孟凯,章倩滢.旅游引导的乡村城市化:以阳朔历村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8):1422-1434.
- [2]卢松,周小凤,张小军,等.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J].热带地理,2017,37(3):293-303.
- [3]余汝艺,梁留科,李德明,等.旅游种群的入侵、继替与古村落空间秩序重组研究——以徽州古村落宏村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8):165-170.
- [4]陈仙春,赵俊三,陈国平.基于“三生空间”的滇中城市群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多尺度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9,26(5):258-264.
- [5]吴艳娟,杨艳昭,杨玲,等.基于“三生”空间的国土开发建设适宜性评价——以宁波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11):2072-2081.
- [6]扈万泰,王力国,舒沐晖.城乡规划编制中的“三生空间”划定思考[J].城市规划,2016,40(5):21-26,53.
- [7]刘燕.论“三生空间”的逻辑结构、制衡机制和发展原则[J].湖北社会科学,2016(3):5-9.
- [8]刘继来,刘彦随,李裕瑞.中国“三生空间”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分析[J].地理学报,2017,72(7):1290-1304.
- [9]陶慧,刘家明,罗奎,等.基于三生空间理念的旅游城镇化地区空间分区研究——以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为例[J].人文地理,2016,31(2):153-160.
- [10]朱琳,程久苗,金晶,等.“三生”用地结构的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84个城市面板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8,39(8):105-115.
- [11]李伯华,曾灿,窦银娣,等.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5):677-687.
- [12]李广东,方创琳.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定量识别与分析[J].地理学报,2016,71(1):49-65.
- [13]单薇,金晓斌,冉娜,等.江苏省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与耦合特征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7):1541-1551.
- [14]王成,唐宁.重庆市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与格局演化[J].地理研究,2018,37(6):1100-1114.

-
- [15] 杨清可, 段学军, 王磊,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转型与生态环境效应——以长江三角洲核心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18, 38(1): 97-106.
- [16] 戴文远, 江方奇, 黄万里,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及生态服务价值研究——以福州新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12): 2098-2109.
- [17] 刘春芳, 王奕璇, 何瑞东, 等. 基于居民行为的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分析框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10): 2113-2122.
- [18] 方方, 何仁伟. 农户行为视角下乡村三生空间演化特征与机理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8(1): 101-110.
- [19] 刘鹏, 陈荣蓉, 杨朝现, 等. 基于“三生空间”协调的农村居民点布局优化研究[J]. 水土保持研究, 2017, 24(2): 283-288.
- [20] 李伟松, 李江风, 姚尧, 等. 三生空间重构视角下的镇域农村居民点整治分区——以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县官垌镇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6, 35(1): 139-143.
- [21] 于辰, 王占岐, 杨俊, 等. 土地整治与农村“三生”空间重构的耦合关系[J]. 江苏农业科学, 2015, 43(7): 447-451.
- [22] 谭敏, 陈浮, 张敏, 等. 基于“三生”空间的乡村综合评析及重构路径研究——以徐州市姚集镇为例[J]. 江苏农业科学, 2018, 46(4): 302-307.
- [23] 李晓青, 刘旺彤, 谢亚文, 等. 多规合一背景下村域三生空间划定与实证研究[J]. 经济地理, 2019, 39(10): 146-152.
- [24] 朱媛媛, 余斌, 曾菊新, 等. 国家限制开发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优化——以湖北省五峰县为例[J]. 经济地理, 2015, 35(4): 26-32.
- [25] 武占云. “三生”空间优化及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J]. 城市, 2014(12): 26-29.
- [26] 席建超, 王首琨, 张瑞英. 旅游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与优化——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的案例证实[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3): 425-435.
- [27] 崔胜辉, 李旋旗, 李扬, 等. 全球变化背景下的适应性研究[J].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9): 1088-1098.
- [28] 龙花楼. 论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转型发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2): 131-138.
- [29] 龙花楼.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J]. 地理学报, 2013, 68(8): 1019-1028.
- [30] 卢松, 陈思屹, 潘蕙. 古村落旅游可持续性评估的初步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10, 25(1): 17-25.
- [31] 何格, 胡艳梅. 景区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评价: 以四川长宁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2, 33(6): 85-90.
- [32] 吴吉林, 周春山, 谢文海.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J]. 地理科学, 2018, 38(5): 755-763.